

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及其利用价值

梁 继 红

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是章学诚生前将自己的著作抄寄友人朱锡庚保存,而由朱氏装订成册者,这一抄本因具备章学诚著作稿本的性质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朱氏抄本《章氏遗著》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图书馆。1985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章学诚遗书》曾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朱锡庚抄本中增补四篇文章,为章学诚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然据笔者闻见所及,除了文物出版社这次选录工作之外,学界并未更多地直接利用该抄本。为此,本文将就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的形成、性质以及利用价值诸问题试述如下,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一、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的形成与性质

乾隆四十四年(1779),章学诚在河南开封遇盗,随身物品并著述文稿一并遭窃。事后,章学诚为使自已著作得以保全,每有著作除留存草稿外,往往抄寄师友保存,以防缺失,而朱锡庚便是当时抄存较多者之一^①。朱锡庚,字少白,号少河山农,又号少河山人,朱筠次子。江藩《汉学师承记》说他,“读书好古,精于左氏春秋”,能继父学^②。章学诚是朱筠及门弟子。乾隆三十年(1765),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从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约两年的时间,章学诚寄居在朱筠家中^③。朱锡庚与章学诚的交谊

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朱锡庚在父亲去世之后,与章学诚的交往很多,现存章学诚著作中有十余通与朱锡庚的书信,评文论学,无所不谈,其中还包含一些品评时人的私房话。二人关系如是亲密,朱锡庚能够较多地保存章学诚的著作也就很自然了。

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现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其上有朱锡庚的藏书印及朱笔题跋文字,亦有用墨笔者,其中国家图书馆藏四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册。国家图书馆四册上有翁同龢墨笔题识文字及其藏书印,原为翁氏旧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之册上有赵之谦题识及其藏书印,知该册原为赵之谦收藏。国家图书馆藏朱氏抄本第三册有朱锡庚的跋语,曰:

实斋长于史学,为乾隆年间一代通人。每有所著,辄钞录寄余。余收藏之成帙,因为装订大小五册。后有阅者幸勿褻视之。……道光三年冬十一月又五日少河山农识。

这几句话说明,道光三年(1823)冬,朱锡庚将章学诚随时抄寄来的零散篇章汇订成大小五册,而国家图书馆与北大图书馆两处所藏恰好是五册。至于朱锡庚原五册抄本何时被分离开来,而后又被分别收藏,以致现分存在两个图书馆,其间的曲折过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今天将两处所藏合观,即可看到朱锡庚抄本之全本,这不能不说是艺林幸事。只是由于所有文章并非抄成于一时,因而各篇在纸张大小、笔迹等方面也是各不相同。

国家图书馆所藏前三册封面上题写“章氏遗著”,第四册题为“导窾集”,从笔迹来看,似为翁同龢所题^④。北大所藏之册封面上题为“文史通义稿本”,似为赵之谦手笔。通观全书,从每册所含篇目来看,朱锡庚在装订成册时并没有严格的编排体例,除了国图藏第三册所汇皆讨论方志义例的文章之外,其他四册无论从文章体裁还是从内容来看皆无规律可循,各册厚薄也不划一,其中还有三篇文章重复^⑤,因此,朱锡庚的装订只是简单地将散存的文章汇集成册罢了。

晚清以至民国期间,有多种章学诚的著作抄本问世,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与章学诚生前就注意自己著作的保存有着直接的关系。据笔者所知,章学诚生前抄寄师友保存的多个抄本中,朱锡庚抄本是唯一完整流传至今者,从这个意义而言,该本就更加珍贵了。这一抄本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因章学诚是随有著作就随时抄寄师友留存,或是单篇,或是一组文章,而并未待自己的著作最后修订完成,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使得该本具备著作稿本的性质。

二、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的利用价值

朱锡庚抄本的利用价值表现为,一是该本保存了章学诚著作最初写成的状态,二是该本上保留了章学诚在写作之初留下的题识文字,三是该本上有多处朱锡庚的题跋文字,尤其是前两者直接说明了朱氏抄本的稿本性质,为章学诚学术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下面就朱氏抄本的主要利用价值分述以下五点:

(一)朱锡庚跋语,尤其跋语中提供了章学诚又字“石斋”的直接证据,有助于全面认识章学诚生前影响。

乾嘉时期考据学居于学术主流地位。由于章学诚的为学路径与当时的学术旨趣不同,以致生前湮没无闻,这已是自民国以来学界通识。焦循在《读书三十二赞·文史通义》条目下题注曰:“章石斋,名学诚,山阴人。”^⑥焦循与章学诚同时而稍晚,焦循错写了章学诚的字直接关系到章学诚是否为同时人所知^⑦。然朱锡庚跋语中不仅称章学诚字为“实斋”,还称呼为“石斋”,其中写作“石斋”者共有两处。就章学诚与朱锡庚的交谊论之,朱锡庚应当不会写错章学诚的字,况且“实”与“石”字形相差很大,这只能说明章学诚还有另一字曰“石斋”。由于朱筠的关系,章学诚得以结交当时学界名流,其后章学诚又游于毕沅、谢启昆等著名幕府。因此,对章学诚生前不知名应作辩证分析。我们可以说,在章学诚的时代,知道他这个人

的人会是很多的,但真正了解他的学问的人,除了一二知几之外,恐怕再无其他人了。由于章学诚的学术研究在当时学界并未占有一席之地,所谓他的不知名,应是指他的学术声望而言,而非他的名字是否为外人所知。

(二)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为章学诚著述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章学诚是一位严于自策的学者,他的学术研究自有一条不断向前发展的线索。如果把立体纵向发展的内容,压缩放在一个平面上审视,将会不得要领,只能附会解释。因此,只有沿着章学诚学术发展的轨迹,纵向贯通考虑,才能把握到章学诚学术思想之真谛,而要把握章学诚学术思想演进的轨迹就必然以著述史的研究为基础。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曾说:“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岁月,以备后人之考证;而刊传前达文字,慎勿轻削题注与夫题跋评论之附见者,以使后人得而考镜焉。”^⑧由此可以想见,章学诚在每篇文章后可能都题注了著作时间。但现通行章学诚著作的版本中,这些标明了写作时间的题注文字绝大多数被刊削掉了。幸运的是,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不仅为我们直接提供了部分文章的写作时间,还为我们考证某些重要篇目的写作时间提供了研究的线索。

1.朱氏抄本《诗教》(上)、《感遇》、《假年》、《记游阳山九莲寺》、《题文丞相遗照》、《题朱沧湄诗册》、《答周篋谷论课蒙书》、《再答周篋谷论课蒙书》、《赠徵仕郎国子监助教张公墓志铭》诸篇标题下皆附注有“癸卯”二字,表明这些篇目皆作于癸卯年间,即乾隆四十八年(1783)。其中《题文丞相遗照》文尾已经附记了该文的写作时间,而《诗教》、《记游阳山九莲寺》、《题朱沧湄诗册》、《答周篋谷论课蒙书》、《再答周篋谷论课蒙书》诸篇的写作时间,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也与朱氏抄本的题注时间基本相同^⑨。这些关于时间的附注文字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修正了以往学者对于《感遇》、《假年》两篇文章写作时间的看法。

过去,学者将这两篇文章判定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因为这两篇文章皆收在《庚戌抄存通义》(下)之中,而庚戌年是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抄存通义》中有的文章是写于乾隆五十四年,于是便将《庚戌抄存通义》中的所有文章都定在了乾隆五十四年^⑩。因此,依据朱氏抄本,我们可以确定《感遇》与《假年》两文应作于乾隆四十八年而非乾隆五十四年。

2. 据朱锡庚跋语,《皇甫持正文集书后》、《唐刘蛻集书后》、《元次山集书后》、《李义山文集书后》、《王右丞集书后》、《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朱崇沐校刊韩文考异书后》、《东雅堂校刻韩文书后》、《葛板韩文书后》、《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韩诗编年笺注书后》、《韩文五百家注书后》等十二文应写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

朱锡庚针对以上诸文有跋语曰:“会稽章氏学诚实斋著,乾隆丁未之秋,持以见示,因留抄录,计篇数十三,癸卯年作也。雨夜校阅一通,八月廿二日大兴朱锡庚矢父识。”但是,我们发现,朱锡庚所谓十三篇,而实际上只有十二篇,或许朱锡庚计数有误,或许后来朱锡庚在装订时有所遗漏,不得而知。根据朱锡庚跋语,这些文章似应写于乾隆四十八年,而非一般认为的乾隆五十五、六年间^⑪。

3. 据抄手留下的抄写题识,《说林》篇应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之前。

朱氏抄本上留下的有关抄写记录为某些篇章写作时间的考证提供了依据。《言公》与《说林》篇前有抄写的题识,曰“甲辰中冬,莲池堤学生周藕塘抄”。据此,《说林》与《言公》应作于甲辰年之前,亦即乾隆四十九年之前。《癸卯通义草》内含《言公》篇,则《言公》篇作于癸卯年即乾隆四十八年应没有问题^⑫,而《说林》与《言公》又同时抄写而成,因此,《说林》篇很有可能与《言公》篇一样,同作于乾隆四十八年。

4. 朱氏抄本为章学诚著作时间的考辨提供了研究的线索。

《校讎通义》是章学诚校讎学专著,该书乾隆四十四年(1779)完成四卷,二年后,因在开封遇盗,不幸一并遭窃。该书朋友家抄存有前三卷,但各家互有歧误,章学诚只得“仍讹袭舛”,一并抄回,但第四卷竟不可复得。直到乾隆五十三年,章学诚在归德书院才重新“校正”一番,得一定本,这便是目前通行的三卷本《校讎通义》。研究者一般认为,章学诚在归德书院的这次校正是对该书的一次彻底修订,改变了原著的文意。因此,现行的三卷本《文史通义》与乾隆四十四年写作时的原稿在内容上应该有很大的不同^⑬。

朱氏抄本《章氏遗著》有《续通志校讎略拟稿》三卷,经笔者研究发现,此三卷本《续通志校讎略拟稿》实际上是乾隆四十四年以前章学诚渐次写成的《校讎通义》稿本,原命名为《续通志校讎略拟稿》。将其与通行的三卷本《校讎通义》相比较,这两种本子只是在字句上稍有出入,而文意上并无丝毫的改变。因此,朱氏抄本更正了学界沿袭已久的观点。我们基本可以肯定,现行三卷本《校讎通义》仍是章学诚在乾隆四十四年写成的本子,乾隆五十三年所谓“校正”只是因各家抄本互有异同而做的一次字句校勘的工作^⑭。

(三)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保留了从标题到文字内容修改的痕迹,为研究章学诚著作修改的规律提供了线索。

1. 篇题的变化

章学诚曾考虑将《质性》篇题改为《文性》,而且还与王宗炎有过讨论,王宗炎复书论道:“《质性》篇题,欲改‘文性’,亦似未安,不如竟题‘性情’乃得。”^⑮因此,王宗炎在为章学诚著作编次目录中将《质性》径题为《性情》。1922年,刘氏嘉业堂刊刻《章氏遗书》虽依据王宗炎所编目录,但仍将《性情》篇题改回为《质性》。据朱氏抄本,此篇文章最早命名为《庄骚》,与嘉业堂刻本《质性》篇相对照,从文章开头“前人尚论”到“质性之论,岂得已哉”近300字为朱氏抄本所无。可以推断,章学诚在写成《庄骚》篇后又增加了一部分内

容,然后改题为《质性》,到最后编定自己著作的时候,又欲改《质性》为《文性》^⑨。

《释通》、《申郑》、《答客问》诸篇是章学诚史论重要著作。对于三者间的关系,庐江何氏抄本《文史通义》已有标明。庐江何氏抄本《文史通义》目录,《释通》下题注“经”字,《申郑》下题注“释通传一”,《答客问》(上)题注“释通传二”,《答客问》(中)下题注“释通传三”,而《答客问》(下)题名下却没有相应的题注文字。而据朱氏抄本,《释通》、《答客问》(上、中)篇题下经传题注与庐江何氏抄本相同,而且在《答客问》(下)题注有“释通传四”。与庐江何氏抄本相比,朱氏抄本的题注文字更加完整,对三者的紧密关系也标明得更为完整。我们认为,经传在这里仅取其相对意义,章学诚以经传附注《释通》与《申郑》、《答客问》题名之后,显然是以《释通》为主旨,《申郑》与《答客问》则是对《释通》的阐发。总之,朱氏抄本题后附注完整地表明了《释通》与《申郑》、《答客问》(上、中、下)之间的密切关系。

朱氏抄本《申郑》篇下不仅题注“释通传一”,而且题有“书友人拟续通志昆虫草木略叙后”诸字。《申郑》篇的写作,缘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及其后学者对郑樵《通志》的訾议。在《答客问》(上)中,章学诚曾提到“《续通志叙书后》”,因此,过去学者曾认为,《申郑》篇原名为《续通志叙书后》,后改称为《申郑》^⑩。但朱氏抄本的题注说明:一“续通志叙书后”只是简称,全称应为“书友人拟续通志昆虫草木略叙后”,二从“申郑”与“书友人拟续通志昆虫草木略叙后”并列来看,“书友人拟续通志昆虫草木略叙后”似是一副标题,而非后来改称为“申郑”。

朱氏抄本中尚有《归马放牛解》及《朱子释理》两篇。章学诚札记中便含有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只是没有篇题,其中《归马放牛解》为《信摭》中的一段文字,而《朱子释理》则为《丙辰札记》中的两段文字^⑪。章学诚主张为学必先以札记为功,现存章学诚学术札记,

如《信摭》、《丙辰札记》、《乙卯札记》、《知非日札》、《阅书随札》等,虽不免粗疏,却与专门的学术论著直接相通。我们可以推定,这两篇文章正是从札记中抽离出来而成为论学专篇的,其中《朱子释理》篇开头的第一段,曰:

近人求汉学而过,则辟宋学之疏。宋学诚不免于疏,然其言理,未可遽谓非也。乃辟之过者,则云理字不见于经,易传穷理,非夫子言。噫!亦过甚矣。

《丙辰札记》中的两段文字前并没有这段文字,显见,这是章学诚在整理成专文后所加。由此,《归马放牛解》和《朱子释理》是章学诚的论学专门文章,而应处于与其他论学专篇相等的位置。

2.文字改动情况及其规律

朱氏抄本与现通行版本相较,除去抄写时的讹误,总体而言基本相同,仅有少量篇章在文字上有所改动。下面选择三篇与刘氏嘉业堂本相比改动较大者,列表以示异同:

(1)地志统部

	嘉业堂本	朱氏抄本
1)	……余于十年前,访洪君于其家,谓此书于今制当称部院,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以明例义。洪君意未然也。近见其所刻《卷施阁文集》,内有《与章进士书》,繁称博引,痛驳分部之说。余终不敢为然。又其所辨,多余向所已剖,不当复云云者,则余本旨,洪君殆亦不甚忆矣。因疏别其说,存示子弟,明其所见然耳,不敢谓己说之必是也。	……余于十年前,访洪君于其家,谓此书于今制当称部院,不当泥布政使司旧文,因历言今制分部与初制异者,以明例义。洪君 <u>拙于辨而意未然也</u> 。十年以来,虽间通书问,绝不及此事,不知其后误否,置之不复忆矣。忽见其所刻《卷施阁文集》,内有《与章进士书》,繁称博引,痛驳分部之说,若以自鸣其得意者。余固未见此书,而书中所驳,多余向所论辨已析,不当复云云者,则洪君亦殆

		忘余所以为言,而姑为是以快其意尔。然道不可不直也,因正定其说,存示子弟,为学古资,非好辨也。其说曰:
2)	……人情乐趋简便……	……人情乐趣简便……
3)	……今戎政为总督专司……	……今戎政为总督专政……
4)	……其任职与前异……	……其任职与前大异……
5)	……画一职方制度,并非无端多此兼衔,此尤生今之时,……	……画一职方制度,更无他义可以解说,此尤生今之时……
6)	……若吏部大计,户部奏销,礼部会试,刑部秋勘,皆止知有十八直省,而不知有十九布政使司。盖因……	……吏部大计,户部奏销,礼部学校,皆止知有十八直省。盖因……
7)	……则闾驷《十三州志》……	……则闾驷《十三州志》……
8)	……奉行台旨……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时事乎?或曰:《统志》乃馆阁书,洪君遵制度而立例,何可非之?余谓《统志》初例已定,其后相沿未及改耳。初例本当以司为主。其制度之改使司而为部院者,以渐而更,非有一旦创新之举,故馆阁不及改也。私门自著,例以义起,正为制度云然。且余所辨,不尽为洪君书也。今之为古文辞者,于统部称谓,亦曰诸省,或曰某省,弃现行之制度,而借元人之名称,于古盖未之闻也。雍正、康熙以前,古文亦无使司之称,彼时理必当称使司。则明人便省文,而因仍元制,为古文之病也久矣。故余于古文辞,有当称统部者,流俗或云某省,余必曰	……奉行台指……岂可不知乾隆六十年中又屡有随宜更制,今日而万无使司领统部之理也?余向与同志言文史著述,则云:例义法度出于事理之不得不然,宜古宜今,不可拘执,但求事理无碍,不可概以古法相绳。所谓俭则从众,泰则不憚违众可耳。故余所论义法皆平心求是,不欲与人立异。盖内不足而求张于外,则立异以明高,学者所宜戒也。又谓:法度义例,粗言之,亦尽人可解。若推论精微至于嫌介疑似,即起古作者于九原,有未易猝辨者,学者所当知也。又云:著述文辞设为问答,不可强作人名。盖问者必浅,而答者必深,问者有非,答者必是。其人初无是言,或偶有是言而未尝固执,今必

某部院,或节文称某部;流俗或云诸省及某某等省,余必曰诸部院或某某等部院,节文则曰诸部某某等部。庶几名正为言顺耳。使非今日制度,则必曰使司,或节文称司,未为不可,其称省则不可行也。或云:诏旨章奏文移,何以皆仍用之?答曰:此用为辞语故无伤,非古文书事例也。且如诏旨章奏文移,称布政为藩,按察为臬,府州县长为守牧令,辞语故无害也。史文无此例矣。

作其人以浅且非而形己之深,而且是于义有所不安。盖有所见而言也。往邵二云学士著《尔雅正义》,洪君驳正其书,为澜翻大篇,刻于文集。邵君若不知也。或询邵君:洪说是邪?君宜改正。非邪?君宜辨之。邵云:后人自有公论。余谓邵君意则高矣。然恐疑误后学,辨而不争,亦君子之道也。凡余所陈多十年前与洪君面述而不能服者,故今不复作书,且所刻与余之书亦并未示余,余亦无可复也。但其书中举余部院之说改为督抚,则余无此谬乱也。余部堂部院之辨分别甚确,洪君似忘之矣。又驳诘余云:有督无抚、有抚无督之处当称督邪?当称抚耶?则余所云抚不兼督、督必兼抚之辨,天下断无有督无抚之地,洪君又忘之矣。又驳诘余云:有一抚两布政者,当称抚邪?当称司邪?此正余所辨使司不当统部之证,洪君反以为诘,未之思矣。夫乾隆乃洪君所生之世,江苏又洪君所居之处,于显然易见之制度似有味焉。然则洪君上推千古以上,博徵万里之外,一切著述恐古人不能留口至今,异地不能覩面相证。噫!近人之通弊也。

(2)感遇

	嘉业堂本	朱氏抄本
1)	古者官师政教出于一,秀民不艺其百亩,则饫于庠序,不有恒业,谓学	唐虞之世,明明扬侧陋,敷奏而明试,明良际遇,风斯盛矣。三代之衰

	业，必有恒产，无旷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习于师儒，于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士与公卿大夫，皆谓爵秩，未有不农不秀之间，可称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为官失师分，方有此等品目。进不得禄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圣贤有志斯世，则有际可公养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至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辟门簞俊之典不举，梦卜旁求之道无闻，圣贤有志斯世，则有行可际可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
2)	……虽然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	……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
3)	……必具志士沟壑、勇士丧元之守而后可。圣人处遇，……	……必有志士丧元、勇士沟壑之守而后可。圣贤处遇，……
4)	……曼倩托言于谐隐，……然而韩非卒死于说，而曼倩尚畜于俳，何也？……	……方朔托言于谐隐，……然而韩非终死于说，而方朔终畜于俳，何也？……
5)	……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遇而执持不当。……	……得其当而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遇而不当。……
6)	……刘歆经术，而不遇……	……贾生俊发，而不遇……
7)	……周人学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	……周人方少而主好用老，及其既老而主好用少，……
8)	……若夫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	……若夫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需綦亟，……
9)	……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于疏远……	……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于贬窜……
10)	……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淳于量饮于斗石，无鬼论相于狗马，所谓赋《关雎》而兴淑女	……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夫才生于天，学成于人，世不数出，求不易得。及其得之，而以

	之思,……	间世不可遇之英,听决择于党援私心之予夺,定妍媸于郑畋女子之爱憎,则学术既成而所以用其学者,谈何容易也!商君陈帝王之说,贾生对鬼神之辞,所谓赋《关雎》而兴淑女之思,……
11)	……则又舍其所长,而强其所短。力趋风尚,不必求慊于心,风尚岂尽无所取哉?其开之者,尝有所为,而趋之者,但袭其伪也。夫雅乐不亡于下里,……	……则又舍其所长,而强其所短。巧饬尝试,无所不为,以谓庶几得之矣。又惧尝试者之浅薄,而未足以入人也,则遂以其学徇之。兼营猝尝,所学未必精也,则猎取近似,掩袭速成。古人毕生之功力不难仓猝假之也。久假不归,则遂以所掩袭者居然自名其学术,而人之称之者,亦遂以谓学术成而见知于时矣。而不知其速成以眩人,掩袭以欺世,固恃世之真知者少也。夫雅乐不亡于下里,……
12)	……天下不知学术,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	……天下不知有学术,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
13)	……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而孟子之……	……此孔子所以恶乡愿,而孟子之……
14)	……然而为是伪者,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昔者夫子未尝……圣贤不废也。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则又不必圣贤。虽梓匠轮舆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昔扬子云……	……然而为是伪者,心知才识未尝不可反求于己而为自得之学也,其意以为非是不足取速成,而炫耀于世,以免沟壑也。昔者夫子未尝……圣贤不废也。学术一成而不可变,不必圣贤也。梓匠轮舆且有不可徇可得而徇者,皆非自得之学也。是以

	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伪以徇焉，非特拘于理之所不可，实亦限于势之所不能也。昔杨子云……
--	---

(3)假年

	嘉业堂本	朱氏抄本
1)	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于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后，书必数倍于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有贱儒者，骛博强识，欺名于当世，世人不察而猥曰：某也才。其人慨然曰：嗟乎！造物假我五百年，庶几读书其无遗憾乎！或举其说以告章子，谓是好学之笃也。章子曰：是好名而愚者也。乌知好学哉？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2)	……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以强致者也。……
3)	……今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	……今贱儒不知为己，而骛博以炫人。……
4)	……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	……今贱儒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
5)	……是妖孽而已矣。	……是妖孽而已矣。其视玩愒废时者，害为尤甚矣。而人或疑其为好学，盖既不知学之所以谓学，则又安知好之所以谓好哉？

以上三篇文章是章学诚在文章写完之后又作了较大修改者，仔细对照，章学诚有关文章的修改可以总结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凡文章写成而后又有所修改者，多是在字句上的更动，或者增加文字，以进一步讨论问题，或删减文字，使表述更加凝练，但每一篇文章的写成稿与最后修改稿所表达的学术观点却不

会改变。综观章学诚的一生，他的思想观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其著作时间没有考辨清楚，而将不同时间完成的著作放在一起阅读，的确存在矛盾抵牾之处。因此，可以说，章学诚的每一篇文章是他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标记”，章学诚也是有意识的要保存这些“标记”，用以检视学术进展与否，而不会以后来已经发展变化了的观点来修正前说。他在《跋西冬戌春志余草》中说：

惟岁月易逝，生平阅涉，多见于文；积而存之，他日展玩，用以自镜，功力有无长进，则玩时旷日之愆，得以少赎，亦未始非近学之一助也。^①

《跋申冬酉春归枌草》又说：

则以每年所著，各自为编，用验学力有进与否。……嗟乎！岁月蹉跎，如此易过，童心犹是，而人见之者谓余叟矣。检视前后，阅涉大小长进，能不滋荒落之惧！^②

因此，章学诚注重总结自己的学问进展状况，不可能以后来的识见重新改写旧稿，否则，学问进展的痕迹就不可见了。而章学诚主张每篇文章下必要题注著作时间也正与此相通，记录下著作时间，则每一阶段学问演进的线索就清晰易见了。简言之，在如上观念的指导之下，章学诚没有修正旧稿的习惯和做法，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在思想观点上。

另一方面，通过将以上两种版本的三篇文章相比较，虽观点未变，但表述方式和语气前后已有很大的不同。其最显见者如《地志统部》，前后有近八百余字之不同，虽然文章观点前后没有变化，但为何作这样的修改，却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章学诚性情激烈，洪亮吉曾有诗评他与汪中论辩，以至“竟欲持刀抵舍锋”^③。章学诚性情之激烈，见于口谈，亦见于笔著。以《假年》为例，朱氏抄本中有三处以“贱儒”称呼驳斥的对象，读来字里行间难免有讽刺挖苦以至谩骂的意味，如此，激烈的感情表露反而有损于对是非曲直的辨析。《假年》开篇即谓“有贱儒者”如何如何，

而修改后则谓“客有论学者”怎样怎样,如此修改则给人以平实说理的感觉,是以“理”服人,而非以“情”夺人。又如《地志统部》,文章中间部分除了因抄写的疏忽而有少数异文外,其他完全相同,但文章开头与结尾部分两个版本却差别很大,几至重写。朱氏抄本该文的开头与结尾实际上重复一个问题,即洪亮吉并没有将《与章进士书》事先寄予章学诚,让章学诚有书信往来辩论的机会,而径直刻入文集,因此,章学诚不得不作专文驳正,中间章学诚又引述了邵晋涵与洪亮吉相类似的例子。总之,朱氏抄本开头与结束仅是围绕着洪亮吉与章学诚私人之间的纠纷上,章学诚也难免有私争胜气的嫌疑,而修改后,则对于两人的过节仅在开头一笔代过,而且结尾处竟说“且余所辨,不尽为洪君书也”。可见,修改后的文字说明,章学诚在论辩的心胸上已然开阔了许多,把重点全部放在学术论辩本身,而不再过多涉及论辩指摘之人。

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在《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中曾说:“今请于辨正文字,但明其理而不必过责其人,且于称谓之间,稍存严敬,是亦足以平人之心,且我辈立言,道固当如是耳。”其下小字自注又补充说:“鄙著亦染此病……,今已知悔,多所删改。”^②这几句话既是劝告孙星衍亦是劝告自己,直接地表明了自身修订旧作的原则,所论与《假年》、《感遇》以及《地志统部》修改的地方正相契合。《假年》与《感遇》写于乾隆四十八年,而后又抄到《庚戌抄存通义》之中,庚戌年即乾隆五十五年,这年章学诚五十三岁,所以,章学诚很可能是在乾隆五十五年将这两篇文章抄入《文史通义》的时候,而对这两篇文章做的修改。《地志统部》则是章学诚六十岁时候的作品,很可能写完后不久即作了修改。我们认为,晚年之后,章学诚着手改掉旧作中锋芒毕露的情绪化言辞,只是他的修改并未全部完成,现存著作中仍然存在着如《假年》中那样带刺的话语。

(四)朱氏抄本《章氏遗著》提供了章学诚著作佚文。

1985年文物出版社在刘氏嘉业堂《章氏遗书》基础上新增十

四篇文章,以《章学诚遗书》为名出版,该书是目前收集章学诚著作最多的一个版本。新增的十四篇文章中包括朱锡庚抄本所有而其它版本所无的共计四篇文章,即国图抄本所含的《书左墨溪事》、《嘉善茜泾浦氏支谱序》、《与朱少白书》、《与钱献之书》,其中《书左墨溪事》后附录抄本原有朱锡庚按语,以及《与朱少白书》后朱锡庚原札,这些篇章为章学诚研究增加了新的材料。此外,朱氏抄本《章氏遗著》中还有一些零星的附记文字。

(五)朱氏抄本《章氏遗著》提供了校勘资料。

由于抄写的原因,朱氏抄本《章氏遗著》存在不少讹误,例如,表中《地志统部》抄本将“阡驷”错写为“阡驷”。但是由于朱氏抄本的特殊性质,该本为章学诚著作不同版本的校勘,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例如,嘉业堂本《章氏遗书》中有《咏史诗》六首,而其中第二首“摩局揣钥不可问,使我拔剑四顾心茫然”句“不可问”三字朱氏抄本作“问不得”,“拔剑”作“投笔”;“大风吹南而反北”句“大”朱氏抄本作“颓”,“反”作“更”;“昂然七尺将何如”句“然”作“藏”。又第三首“安能顿使贤愚臭味之交通”句“安”作“那”,“顿”作“遽”。除去抄写致误,与其他版本相较,这样有价值的异文材料还很多。受本文篇幅所限,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结 语

朱锡庚抄本《章氏遗著》因具备著作稿本性质而弥足珍贵,提供了许多新鲜资料,尤其对于深入研究章学诚著作修改、著述史等具有突出的利用价值。最后,我们想指出的是,应以章学诚著作最后完成稿来评论其学术研究成果,并且当读到章学诚著作中那些略带尖刻的话语时,似应作他还未来得及修改的设想。

注:

①事见章学诚的《跋西冬戌春志余草》,该文记载抄存较多者,除了朱锡

庚外,尚有史致光、周震荣等(章学诚著《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页 325)。然据章学诚其他著作零星所述,邵晋涵、沈业富、翁方纲等,也应有不少章学诚著作抄本。

②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 1983 年版,页 68。

③胡适著、姚名达订补:《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页 16-20。

④翁同龢将第四册题为《导窾集》,并不正确。该册中有《导窾集叙》一文,但此册并非是《导窾集》一书。

⑤这三篇文章为《方志立三书议》、《与陈观民工部论史学》、《大名县志序》。

⑥[清]焦循著:《雕菰集》,丛书初编本,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页 87。

⑦钱穆先生以焦循《读书三十二赞》题注曰“章石斋”,认为“较之钱东生之误章为张,亦相胜一肩而已”(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页 459)。

⑧《章学诚遗书》,页 70。

⑨参见《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页 55-58。

⑩《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以及《实斋文字便年要目》皆据《庚戌抄存通义》,而将《感遇》及《假年》定在乾隆五十四年,因《庚戌抄存通义》中《经解》、《原学》诸篇写于乾隆五十四年。《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页 67-72;《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页 466。

⑪参见《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页 9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页 467。

⑫参见《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页 55。

⑬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页 465;王重民著:《校讎通义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页 3。

⑭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探讨可参见拙文“论章学诚校讎理论的发展脉络”,文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 4 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页 484-501。

⑮“王宗炎复书”,《章学诚遗书》,页 624。

⑯庐江何氏抄本《文史通义》《质性》篇亦题为《庄骚》。光绪年间,江标曾据该抄本所有而刻本所无者总汇为一卷,题名为《文史通义补编》,刻入《灵鹫

关于况周颐的暖红室

今年《文献》第 1 期上所载拙文《况周颐和暖红室〈汇刻传剧〉——读〈况周颐致刘世珩手札二十三通〉》，是我去年 9 月初赶写出来的。初稿曾请郑志良博士看过，承他指出行文中的某些疏忽。当时我正有远行，行色匆匆，未能及时订正，现将暖红室校曲事订正于下：

况周颐《〈汇刻传剧〉题辞》第二首云：“梦凤箫楼重回首，暖红兰室两同心。词场倭指《阳春》曲，几见知音在瑟琴。”其下注曰：“先生刻书，多与夫人合校。德配江宁傅偶葱夫人春澈，字小凤；继配江宁傅俪葱春姍，字小红。梦凤楼、暖红室所由名。”拙文页 193 倒数 9 行括弧内“另一位是继室傅春澈”，当删去“继”字，改为“正”字。志良亲自查阅过刘世珩的家谱，承钞示《贵池南山刘氏宗谱》关于傅春澈生卒年的记载：“聘江宁县广东盐课大使傅讳鑫公之女傅氏（凤），同治甲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卯时生，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子时卒。”可知，傅春澈适刘世珩不久就辞世，时年才二十岁。刘氏光绪二十六、七年刻《董西厢》，才有《汇刻传剧》之举，因此，傅春澈不可能参与校曲。我未经仔细查考，过于相信况周颐的说法而致误。（吴书荫）

阁丛书》之中。

①参见《清章实斋先生学诚年谱》，页 30。

②分别见《章学诚遗书》，页 367-368，页 389-390。

③《章学诚遗书》，页 325。

④《章学诚遗书》，页 325。

⑤《续怀人诗十二首·章进士学诚》，《卷施阁诗》卷十五，《洪亮吉集》（2），中华书局 2001 年版，页 810-811。

⑥《章学诚遗书》，页 639-640。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